



人大重阳

# 研究动态

第 47 期

2014年5月20日

## 日本社会经济面临的总危机及其走向

——安倍经济学遭遇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日本道纪忠华智库首席研究员 · JCC 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庚欣

最近，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在日本政治外交领域，岛争、参拜、武器出口、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等，但似乎相对忽略了日本在国民生计、税负、社保等社会经济基础领域正酝酿着重大的危险，甚至可能带来社会经济的总危机。安倍经济学乃至执政的稳定性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及中日关系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连锁效应。



## 一、安倍经济学出师不利，未能缓解日本经济的病症

安倍上台一年多来，推行安倍经济学，实施的金融宽松（量宽）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吸引民间投资为目的经济增长战略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上市大公司的业绩有明显好转。但日本经济的长周期、结构性病症使安倍经济学难以真正生效，量宽（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兴旺，反而在刚性的能源等进口增加对照下，更加反衬出日本贸易赤字的不断创出新高。日本财务省4月21日公布2013年贸易统计表明：日本这一年贸易赤字达13.7万亿日元，又创历史最高点，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智能手机进口增多，但出口依然低迷。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依然不振，股市持续震荡，就连本来令日本举国欢庆的“东京奥运”也成了今年2月东京知事选举的话题，前首相细川（候选人）居然提出放弃“东京奥运”申办权。安倍经济学不能如愿以偿，反而出师不利，其根源在于日本经济已久病在身，仅靠这些“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取得根本性好转。

例如，安倍经济学排在第一位的是金融量化宽松（量宽）政策，因为操作币值常常是最通俗易懂、最易于取得效果的政策措施。一般人们都认为日元贬值肯定有利出口，刺激股市，减少赤字逆差，至少预期是这样。但现实中由于日本处于经济长周期的饱和阶段，日元长居高位，贬值压力过大，这一年来贬值近三成，却仍显出口价格竞争力不足。而且，一些日本国内厂家为了维持利润率水平，出于对日本国内产品高附加价值的自信，2013年甚至还出现了以日



元换算出口产品价格比上一年上涨 9.3% 的异常情况，这个上涨率是时隔 33 年的最高水平。这当然影响到其竞争力。另外，长期日元走高也使国际分工、价格结构及其利益链条已经形成，很难马上脱胎换骨，改弦更张，日本国内制造业外移的基本趋势也很难改变，即使转型向日本国内回流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还要看日元贬值是否属于持续性中长期现象。近来日本股市起落很大，也与人们的市场预期不一致有关。

在出口不利的同时，日本又因地震等造成核电下马，在占电力能源动力三成的核电必须转型为天然气等能源时，日本进口大增同时加上日元贬值的三成，两个“三成”里外加码，又得不到出口增加的缓解效果，压得日本的贸易赤字不断刷新，至今日本进出口形势仍无明显好转。因此盛传安倍可能在美国放缓量宽政策之际仍要继续压低日元。可见，日本的病是长期形成的综合性病症，不是安信用一两剂药就能够治好的。

对于安倍经济学及其政策一年多来的效果，日本各界反映都不积极。朝日新闻今年 3 月 18 日公布民调结果显示，认为自己生活这一年“无变化”的人近 80%。对安倍经济政策能否带动经济成长，去年 4 月表示“期待”的有 55%，但今年已经降到 45%，稍多于“难以期待”的 37%。

至于安倍经济政策是否与工资、雇用增加有关，去年 4 月和 5 月的调查中，认为“有关联”者比“无关”者多，但从去年 6 ~ 8 月的调查即出现逆转，认为“无关”者开始占上风。这次，认为“有关联”者为 40%，依然少于认为“无关”者的 43%。



对于安倍经济政策使自己生活有何变化，回答“变好了”的只有“5%”，回答“恶化了”的 16%，“无变化”的 78%。60 岁以上者回答“恶化了”的占 2 成，引人注目。

要注意，安倍经济学是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民已经习惯成自然、普遍期望值很低的情况下，动用很多资源推出的。民众因为对民主党执政无方的反感，对安倍及其经济政策本来寄予一定期待，加上日本战后经济与生活相对还是稳定的。因此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并不吹毛求疵，反而大都以宽容心待之，因为人们都知道日本经济改观难度大，并不奢求。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民意大幅度的反弹。但是经济实践特别是直接的生活感受等，使经济常识丰富的日本民众开始失望，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这一年来明显下滑，可以看出这些政策即使面对这样比较宽容的民众，依然难以达到“及格”水平。

一年多来各种民调都显示，对安倍政权的支持，60% 来源于经济政策，外交等政治因素只占 10% 至 20%。这也符合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性格特征。如果经济上都失望大于期待，那么安倍经济学乃至政权稳定性面对挑战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这是目前日本社会经济面对的基本态势，也是下面进入本文主题的前提解说。

## 二、日本处于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前夜

其实，日本近年来一直存在爆发经济及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今天已经走到了面临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前夜，因为多种因素已经具备了总危机的基本性质。



（一）以 311 大地震为标志，日本进入生活质量的绝对下跌阶段。这是社会经济总危机的直观性表象

311 大地震其实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灾难、大危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日本在基本生存方面丧失了一直以来的安全稳定性；在能源供给方面出现了“弃核”等颠覆性变化，对于日本这样能源、资源极度匮乏、本冀望“核能”成为社会经济支柱的国家来说，这无疑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在衣食住行等国民生活质量各方面，都呈现出战后从未有过的绝对水平下跌的情况。这是社会经济总危机最直观性的表象。

十几年前，日本就已经宣称进入了“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成长阶段。但 311 大地震后，日本人在家需要两张图“地震预测分布图”与“核辐射超标图”，吃菜喝水都颇费思量。想出门到美欧躲躲，又需要一张“世界恐怖袭击警示图”。偌大的世界，竟容不下人们“衣食住行，平安保命”的最原始愿望。至于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就更难保障。这与一般周期性危机起伏造成的失业等明显不同。这种危机影响人多且不分族群。据学者统计，仅以日本核电站周边 50 公里为避难区，就将涉及 1200 万人，相当于日本人口 1/10，这完全不同于一般偶发的局部灾害。这种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在战后从未有过，而且在日本还将产生复杂的连锁效应，现在还仅仅是开始。

（二）今年 4 月 1 日消费税上调启动“增税加负”浪潮，将经济困难的巨大压力再度直接施加在民众头上，引发民意浮动与反弹。这可能构成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引爆点

近来，日本最流行的词汇，就是“消费税”。今年 4 月 1 日开始，日本终



于再次将消费税从 5% 上调至 8%。这是继 1989 年出台消费税 3%，1997 年上调至 5% 之后，时隔 17 年的再次上调。这项增税法案并不是安倍内阁决定的，而是两年前民主党执政时通过的。

增税法案的理由，主要是日本社会保障体制出现严重亏空，需要开辟新的财源来填补亏空。换言之，日本由于少子老龄化问题，交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的年金基金漏洞越来越大。国民医疗保险基金也大致如此，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崩溃。刚刚通过的日本 2014 年度的国家预算显示，全年 95 万亿日元的国家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就高达 32 万亿日元，占据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不得不依靠提高消费税，来获取填埋漏洞的新财源。

由于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屡创新高，按债务占 GDP 的比重看，日本已经位于世界首位。因此日本在法律上决定了今后增税的时间表：2014 年 4 月 1 日，消费税率从 5% 上调至 8%。2015 年 1 月开始，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上调、继承税将增税。2015 年 10 月，消费税率将再次上调至 10%。从 2016 年开始，年收入 1200 万日元以上的所得税将增税，从 2017 年开始，年收入 1 千万日元以上的所得税将增税。可见，今日的消费增税，只不过是进入“加税增负时代”的入口而已。

这样的举措，可能形成下列恶性循环：“增税加负”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绝对下降 消费水平绝对降低等进一步导致经济全面弱化、冷化，加上外交失衡造成外部环境恶化 民众经济上的困难与失望会进一步加大，这些压力可能逼日本政府作出更强硬的选择 这样就更加破罐破摔，最终导致危机。因此，消费税上调启动的“增税加负”，可能会构成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引爆点。



从 4 月开始的消费增税，使日本的基本价格变化如下（4 月 1 日统计）：

运输、公共费用：

新干线（指定席） 东京——新大阪	1 万 4050 日元→1 万 4450 日元
JR 新宿——大宫	450 日元→IC 卡 464 日元 售票 470 日元
出租车 东京都心起始价格	710 日元→ 730 日元
通常明信片	50 日元→ 52 日元
NHK（电视）收信费（月額） 仅限地波、转帐	1225 日元→ 1260 日元
电费（月額） 东京电力公司管区 平均水平家庭	8111 日元→ 8541 日元 （4 月） （5 月）
煤气费（月額） 东京煤气公司管区 平均水平家庭	5818 日元→ 6063 日元 （4 月） （5 月）
公用电话（市内、白天） 10 日元通话时间	1 分钟→ 57.5 秒

商品 · 服务

自动售货机的饮料 “可口可乐”350ml 罐	120 日元→ 130 日元
快餐 汉堡包店	310 日元→ 319 ~ 390 日元→ 401 日元
香烟 JT	410 日元→ 430 日元
东京迪斯尼休闲区 大人 1 日券	6200 日元→ 6400 日元
东京晴空塔（Tokyo Sky Tree） 成人、瞭望台	2000 日元→ 2060 日元
报刊 朝日新闻日报晚报	3925 日元→ 4037 日元月 订报费
100 日元货店 100 日元旋转寿司店	105 日元→ 108 日元 银行 ATM 手续费



## 消费税非课税部分

租赁住宅的房租
土地的买卖、贷付
保险诊疗、看护保险对象的服务
学校应试费、入学金、学费、教科书费
火葬费、墓地永久使用费

仅就消费增税一项来看，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消费税率从 5% 升至 8%，2014 年度的日本全国家庭生计负担将增加 6 万 3000 亿日元（国民人均约加负 5 ~ 6 万日元）。4 月开始负担增加，不仅来自消费税增税，年金保险费等负担每年也将增加 5 千亿日元，作为过去物价下降的反映，高龄者的年金支給额也会减少。

公立高中免费入学的体制也被停止，代之而起的是从 4 月新年度新生开始，年收 910 万日元以上的家庭将要收费。4 月以后满 70 岁的高龄者，到 74 岁在医院窗口自己负担的医疗费比例将从一成增至 2 成。今年 6 月，用于东日本大地震复兴预算的住民税增税（每年 1 千日元）也将开始。

另一方面，对于消费增税直接冲击的低所得者家庭的支援很少。2013 年度补充预算中，免交居民税的低所得者（约 2400 万人）给予一次性现金补贴（一人 1 万日元 ~ 1 万 5000 日元），对育儿家庭也有类似的一次性补贴。

据统计，仅今年日本家庭生计总计负担增加约为：

消费增税 6 万 3000 亿日元

社会保险费的负担增加 5000 亿日元

地球温暖化对策税增税（加在煤气费等费用中）900 亿日元

年金的减额（对应物价下降）8000 亿日元

70 ~ 74 岁医疗费自己负担增至 2 成 2000 亿日元





总之，消费税率上调的负担增加加上社会保障调整等的影响，2014 年度比 2013 年度，估计将新增加 8 万亿日元的家庭生计负担。

### 今年日本各类家庭的负担增加情况

家庭类型	年收	负担增额
一人工作的 4 口之家 夫妇一人工作、两个孩子为 3 岁以上、初中学生以下	300 万日元	2 万 7800 日元
	500 万日元	5 万 4800 日元
	1000 万日元	12 万 9600 日元
	1500 万日元	17 万 7200 日元
两人工作的 4 口之家	1000 万日元	12 万 2300 日元
单身家庭	500 万日元	6 万 9500 日元
年金夫妇家庭	240 万日元	4 万 1800 日元

这是根据内阁府的试算，新制度持续 1 年时，比上一年负担的增额。医疗费负担增加是从满 70 岁者开始适用。上表是 2014 年与 2013 年的比较。年金夫妇家庭是指丈夫领取厚生年金，妻子领取基础年金、无工资收入的情况。负担增额是指因消费增税和复兴特别税、社会保险费提高等“负担增加”，减去育儿家庭和低所得家庭等领取“补贴金额”后的金额。不包括物价变动等因素。

夫妇每年领取 240 万日元的年金家庭，2014 年一人可领取 1 万 5000 日元（计 3 万日元），但生活可以使用的金额（实质可处置所得）比上一年将减少 41800 日元。年收 500 万日元的 4 人家庭（夫妇一人工作，两个孩子），因属于育儿家庭可以领取 2 万日元补贴，但生活可以使用的金额（实质可处置所得）比上一年将减少 54800 日元。这就是所谓“绝对贫困”的生活质量下降趋势。

根据朝日新闻 3 月底的民调显示，就 4 月消费税增至 8%，回答家庭生计负担“加重”的合计达 79%，回答“非常加重”的为 18%， “一定程度加重”的为



61%。其中特别以 40 ~ 50 岁者居多。

对于明年 10 月消费税 10% 上调，回答“赞成”的为 23%，回答“反对”的为 68%，相差悬殊。男性中“反对”者占 61%，女性中占 74%。

其实，有些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上述日本内阁府的试算，是比较温和、带有粉饰色彩的评估。因为全面增税必然带来物价全面上涨，尤其是核能停摆后，代之以进口天然气等作为动力。日元贬值等导致进口价格上扬，电价也将在春季同时上涨，这类成本价格上涨必然带动各类物价整体大幅度提升，而收入却并未相应增加。

近日日本各大媒体都以“物价上升，工资不足”为题，结合增税大做文章。据统计，日本物价已经 9 个月连续上升，其中最显著的是家电。电视 2 月上涨 5.8%，比 1 月上涨的 3.7% 幅度更大。空调、洗衣机也都在涨价。在消费增税带动下，物价将继续上扬。而日元贬值带动进口价格上升，食品、电费也将持续上升。东京 23 区的月度速报比日本其他地区更快：3 月物价上涨率比 2 月还高，并持续该趋势。预计 4 月后物价增幅将超过 2%，与现在的物价变动一并使增幅达到去年的 3%，这是泡沫经济以来，日本从未有过的物价上升，日本民众只能面对。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部分企业在各方压力下，虽有涨工资的动向，但追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日本金属工会协会（由电机、汽车、钢铁等制造业的产业工会等结成）3 月 27 日发表的今年“春斗（要求涨工资的谈判等）”中小企业等工会的中间统计表明：相当于“基本工资提升率”的工资上涨比去年同期约增 240 日元（2、3 美元），为 1246 日元。未达到“基本工资提升率”1% 的要求。3 月 24 日统计：包括对应工龄等的定期提薪部分，企业上调率为 2.23%（1187 个工会统计）。



而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交涉收效却明显很差，工资上调率普遍走低。

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试算：年收入 400 万 ~ 450 万日元的家庭，因物价上升及增税，家计负担年约增 9 万 2000 日元，而收入按今年“春斗”中达成的意向，平均仅能增加 2%（包括定期加薪），即使实现，也只能增收 7 万 9000 日元，而且会更明显感到物价上升。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政府虽然在工资上调之外，还考虑向低所得家庭给予现金补贴等对策，但如果工资不能持续上调，家庭生计就不敢放开。日本经济财务相甘利明 3 月 28 日称：“希望工资上调能扩展到中小企业，而不仅是大企业”。但这种经济的良性循环仍前景不明。

据日本 INTAGE 调查公司 4 月 18 日至 20 日对日本全国 20 岁至 69 岁的男女 1000 人进行网上调查，近 7 成民众表示要收紧消费，节省家计支出。税率上调后，收入有所增加者只有 1 成多。而“基本工资提升”者只有 4.6%。

工资低，难上调，再加上日本正式职工录用仍然低迷，更加剧了民众收入的不升反降。今天，日本人生活上除上述“地震预测分布图”、“核辐射超标图”之外，还要再加上“增税涨价图”，衣食住行都受到较大的影响。这种压力与地震等造成的灾害有所不同，因为人类在面对共同敌人——自然灾害时有一种同仇敌忾、反而缓解社会冲突的天性，尤其是日本这种单一民族、比较团结，全民抵抗灾害意识很强的国家，在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常常表现出特有的凝聚力，这也是 311 地震后日本虽受害极重却并未出现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但是，人们受害之后的痛苦即使暂时不予发泄，却不等于消失。如果出现其他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刺激时，很可能会综合发酵，外化表达出来。尤其日本地震之后救灾等工作



不力，政府及企业的对应迟缓备受指责，有关救灾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例如 4 月底，地震重灾区福岛县发布家庭调查结果，全县对于居住、身心健康、生活资金等感到不安者均超过 50%。这时再加上消费税上调启动的“增税加负”，将各种困难转嫁到民众身上，必定更加刺激日本民众与社会的情绪，引发民意浮动与反弹，由此引爆社会经济的总危机，这种矛盾的综合性爆发，可能是安倍经济学乃至安倍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

（三）经济困难会深化日本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使安倍保守化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选项，这是酿成日本社会经济总危机恶性发展的政治根源

日本在上述经济特别是国民生计、税负、社保等社会经济基础领域面对的困境，恰好与今天日本政治经济的多重矛盾不期而遇，使本来已经很复杂、困难的局面蒙上了政治的阴影。

应该指出，日本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今天有冲突与依存的双重表现。一方面，从 2012 年底上台开始，安倍政治学就与安倍经济学出现互相“打架”的矛盾。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京奥运。本来东京奥运是一个很好的“中长周期”增长点，对于日本有很积极的刺激意义。东京奥运作为一个资本运作收益期，具有号称 300 亿美元的奥运直接经济效应以及 15 万个就业机会，注定会给日本注入活力。同时，“奥运”还会成为一个推动全面合作、相互理解的积极要素，对于外向型发展的日本而言，无疑提供了极大的利用空间。但是，这个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却受到了安倍政治学目前正在构思并实施的政治发展周期——武器出口、松绑集体自卫权、修宪、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等影响，特别是日本这些政治举措都



与错误的历史观（参拜靖国神社等）、亚洲观及领土悲情纠集在一起，综合发酵。这样的政治周期与奥运的经济周期必然发生碰撞，当然会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但另一方面，安倍政治学就与安倍经济学又具有相辅相成的相互利用、依存的关系。首先，在历经一年推动的经济政策见效不大的情况下，安倍开始考虑利用政治手段为经济“帮忙”。今年4月1日，安倍政府通过了旨在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把过去隐性的武器技术出口“化暗为明”，使日本的武器出口合法化。这当然主要是一个政治动作，实质上是要否定战后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造，逐步架空和平宪法第9条，为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铺平道路。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举措，因为日本有2000多家企业生产军品，可生产坦克、飞机、舰船、导弹及通信侦察器材等各式军事装备。光纤、半导体、超导材料、机器人、复合材料及微电子等诸多领域拥有先进技术，有些技术甚至领先美国。如果日本各大汽车厂商都投入生产装甲车辆，只要将部分汽车生产线转为生产军品，装甲车年产量就可高达万余辆，日本造船业早就具备建造航空母舰和大型驱逐舰的能力。这样适于“政治表现”又“钱途无量”的松绑举措，自然会给日本政治经济同时带来“生机”，“日本经团联”等也表示支持。而且，一旦日本踏上武器出口的轨道，那么制造国际冲突、加剧紧张局势，就会与扩大军工收益形成“正相关”变动，后果自然不难想象。

其次，由于安倍政权急速向右转，在行动上全面向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摊牌”，毫无顾忌地挑战中韩等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使日本与中韩等国很难像过去那样保持“政冷经热”的局面，也开始出现政经互动、恶性循环的新特征。



这就使得日本的危机很可能出现恶性质变，政治外交上的纠纷很难像过去那样被人为地控制在原有纠纷领域不扩散至经济贸易等领域。最近两年中日经贸额的减少就说明了这个新特点已经出现，这是一种双输的游戏，但正在成为中日现实博弈的客观走向，无疑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自然在于我们（中日双方）有没有能力和智慧来管控这种局面。但是，这种矛盾肯定会对日本目前的社会经济危机带来更大的政治外交变数，这是毫无疑问的。

（四）国际社会和平的、不可逆的此消彼长式变局使日本的困境更具持续性，这是日本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国际背景

人类自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步入“和平发展”时代起，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局。第一次是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社会重组，形成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全球新格局。今天，世界正在经历第二次变局。这次变局大致始于 2008 年西方反恐不力与金融危机，直至最近日本大地震与反恐局势演变，引发发达国家的总危机，并与新兴国家崛起构成“此消彼长”的互动，从而构成国际社会战后罕见的变局。日本今天的危机恰好构成这个变局的一部分，而且受到国际大变局的制约。

这次国际大变局的参照性表象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的相对下滑，恰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急剧崛起相反相成。这种“此消彼长”主要是世界进入一体化格局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全新作用。这次总危机的特征在于新兴经济体并非以“战争”、“重新瓜分”等方式挑战发达国家，而是在一体化的互惠合作共存中，在让利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换取自身和平发展的机遇，通过静悄悄的和平竞



赛形成亦友亦敌的博弈关系。各方实力消长的这种“非颠覆性”是对“和平发展”时代的细节诠释，而且呈现了明显的“不可逆”的特征。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变局，首先是因为世界实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多极化”已经成为基本特征，任何大国都很难再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其次是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体化”国际市场及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使得互惠共赢成为现实利益机制，零和对抗的成本过高，削弱了挑起冲突的利益动机。再次是大国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型、成熟的大国关系”不仅在中美之间，也在世界所有大国之间显露端倪。虽然还不能使大国之间杜绝争斗，但至少可以培育新的合作氛围，使上述客观变化贯彻于大国关系的互动之中。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近年来连美国都很难在战争中获利，只能冀望于发挥巧实力、软实力，美国为反恐等战争动乱付出的代价就是时代潮流的反面教训，而中国等坚持和平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今天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日本在这场变局中同时经受了大的经济周期上的“弱化”效果与发展不平衡规律“消长”效果的冲击，而且是在完全和平、非颠覆性的一体化格局中逐渐走向今天的困境。这就使得任何希望借助其他非经济手段（如炒作中国威胁、构建亚洲小北约等）改变这个格局、或扭转变局方向的企图很难得逞。这不仅是日本，也是美欧共同面对的困境。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成熟、进步的象征，使得日本在面对危机时的选项受到了限制。日本只能在这个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 三、日本面对经济危机的出路选项

日本面对目前的危机挑战，有人估计安倍会走向妥协、软化；也有人认为，越是经济、生活层面面对危机难以自拔，安倍政权可能越会求助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功能，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前者当然似乎顺理成章，符合各方利益，可能性比较大。但从安倍背弃自己 7 年前的政治承诺，出尔反尔地参拜靖国神社（结果给日本带来极其被动的政治后果）的举动来看，“合理主义”并非日本政治最主流的选项。回想当年战争期间，日本完全失控的政治恶性膨胀，最后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今天的安倍，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可能正是由于日本民众在经济预期上的低落，才使得安倍更加希望利用政治保守化的杠杠，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存。只是今天日本的综合实力在世界上、在东亚，已经与 80 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从美国在这次海牙核峰会（3 月）前迫使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软化，促成美日韩三国峰会的情况来看，安倍所谓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其后，日方马上就传出“中日首脑会面条件说”，似乎又在进行某种政治外交试探。这说明安倍不是没有可能做出某种政治让步。从安倍从政的经历尤其是两次出任首相期间的表现来看，安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两面性很突出，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他曾开展对华破冰之旅，也没参拜靖国神社。其实当时他的历史观等与现在几无二致。对安倍这样的生长在和平时期的日本政治家来说，历史问题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筹码，主要会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调整，而且日本的民众包括保守势力，也不会对安倍进行这种妥协、调整





时，明显改变对他的态度。这从他上次任首相时一改故辙，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并未影响保守派对他的支持，使之仅在 6 年之后又再次入阁封相的情况即可看出，安倍有这样的政治操作空间。

4 月底，奥巴马访问日本，表达了强硬支持日本的态度，引发了一些对安倍今后走向的新的猜测。现在，国内外一片紧张气氛。其实，事态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奥巴马强调的“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都是美国的一贯立场。更说得明白一点，中日在钓鱼岛、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的争斗，本质上都是中美的博弈。美国本来就是日美同盟的主导者，日本不过是美国的管家，当然是一个喜欢打自己小算盘的管家。这次比较新的观察点在于：是乌克兰危机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怕中国会步俄国后尘，在东海、南海也突然“用实力改变现状”，而美国自己却“力不从心”。因此一希望靠声势上的强硬弥补实力上的弱化；二是希望靠盟国的力量替代自己本身的缺位。日本对这些看得也很清楚，知道日美关系中，美国无论哪个领域、哪个时期，都是利益的主导方。因此，日本并未因美国在“钓鱼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问题的表态而领情，在 TPP 议题作出让步。而且，安倍同时就派出了一系列重量级人士访华（如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和高村正彦为首的超党派议员团等），并还将做出一系列动作，加大与中国的沟通力度。因为，安倍两次任首相的最大区别，一是发生了钓鱼岛纠纷，二是中日综合实力的逆转，安倍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不足。这次，奥巴马的支持，使安倍增添了自信（筹码）。并且，无论奥巴马如何强硬，日本社会经济上的危机态势，并不能因此有所缓解。美国最近一直在东亚采取平衡战略，左右逢源，日本自然心知肚明。因此，美国要从日本得利，想靠美国解



决日本的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安全上，都是不现实的。日本的出路只有自己去寻找。中国当然是选项之一。而且，即使安倍真的要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问题上有所突破，也希望得到中国的谅解，实现软着陆。因此不能排除他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做出一些有分量的动作。